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从人口学到老年学

邬沧萍自选集

邬沧萍◎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NG RENKOUXUE DAO LAONIANXUE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邬沧萍
◎ 著

从人口学到老年学

CONGRENKOUXUE DAOLAO NIANXUE

——邬沧萍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人口学到老年学: 邬沧萍自选集/ 邬沧萍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81119-934-5

I. ①从… II. ①邬… III. ①人口学—文集②老年学—文集 IV. ①C92-53②C913.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111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CONG RENKOUXUE DAO LAONIANXUE

从人口学到老年学

邬沧萍自选集

邬沧萍 著

项目统筹: 杨林玉	责任编辑: 寒 梅
责任设计: 王征发	封面绘画: 王征发
责任校对: 李佳艺	责任印制: 沈 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39.25 插页 1

字 数 465 千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汤一介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何兹全 宋贵伦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黄枬森 龚育之 童庆炳
满运来 蔡赴朝 戴 逸

编委会主任 常 卫

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史秋秋

编委会副主任 张文启 张兆民 孙向东 杨学军 陈 鹏
陈之昌 陆 奇 辛国安 庞 微 单允茹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卢颖华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陈平原 陈 来 陈雨露
郑红霞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崔新建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 委 会

2009年11月

我同人口学和老年学结下不解缘

一、我同人口学的历史渊源

我同人口学很早就有点渊源。新中国成立前就接触过人口问题。1971年后，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就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我这时参加一点翻译工作，至今我仍然在从事人口研究。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近40年，我是研究人口问题为时最长的一个。中国人民大学今年三月，授予我一级荣誉教授称号。2006年我办理退休后，仍继续受聘为博士生导师。今年一月被中国老年人体协、中国老年协会和全国妇联授予“第七届全国健康老人”称号。我今年仍然继续招收博士生。最近几年，我每周都照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偶尔还有些教学或学术报告。现在，我还不时发表文章，最近花了不少的时间，完成了一篇纪念建国60周年的文章，谈到我亲历我国人口学60年沧桑的新认识。我从事人口学和老年学的研究是机遇的巧合，但也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我在香港、广州岭南大学读的是经济学，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学院进修，学的是对外贸易和海关业务，后受派遣在香港的中国九龙海关当过两年公务员。1948年赴美留学，在纽约大学取得MBA学位后，

继续攻读博士，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专修统计学。我的知识结构，同人口学本来关系不很大。我在美国留学期间，人口学还是鲜为人知的学科。在美国当时，只有普林斯顿大学有专门人口研究机构。但在那个时期，世界上都在热衷于研究国民收入，我和中国学者、留学生都踊跃参加这些研究讨论课程。我们参加了世界国民收入的比较研究课题，利用了美国图书馆丰富的研究资料。经过反复的比较计算，我们研究发现，1936年是旧中国最好的年景，人口如果按4.75亿来计算，这一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6美元，相当于美国当时的 $1/60 \sim 1/70$ ，计算和研究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真正懂得旧中国贫穷到什么程度，同富裕国家差距有多大。当时，我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学分学费是30美元，这一比较对我刺激极大，我认为我国贫困落后同中国人口过多关系极大，这项研究结果大大促使我响应党的号召，回国参加革命和新中国建设。

在我决定回国参加革命前，我和进步的同学学习过毛泽东同志1949年写的《历史唯心主义破产》，回国后我们也反复地学习，这篇宏文使我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从哲学上和政治上有了质的飞跃，但是中国人口过多和贫困问题的关系始终挥之不去。

回国后，我在北京高校工作。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仿照苏联教育模式，取消了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北京原来从事社会学、人口学的教授们都重新安排工作，这就等于官方宣告，在社会主义下，不存在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人口学和社会学是无足轻重的。那时，我先在辅仁大学，后在中央财经学院，次年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在统计系任教。不久，我就认识了当时北京几个高校的经济系和社会学系的知名教授，他们很多是我曾仰慕过的人口研究的知名学者，如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费孝通、罗青、戴世光

等。1953年，我作为统计学系教师参加当时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突破，我也从参加普查中学到一些人口调查的知识和方法。

普查后，有识之士都焦急地等待着普查的结果。1954年，全国公布的普查数据为6.02亿，人口数据大大超过原来认为的4.75亿的估计数，高出1/4，这个人口数，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议。我所认识的老一辈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发表议论，开会讨论，许多医学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都发表意见。那个时期，中国的学术杂志不多，在《新建设》、《人民日报》、《文汇报》等都有不少关于人口的文章，大多数的知名学者都认为，我国人口过多，需要尽快节制，但也有一批声名显赫的权威学者反对，他们甚至把主张控制人口者视为马尔萨斯主义者。那时，我还在学习马列主义期间，没有参加到讨论中来。我认为争论双方都缺乏人口数据来支持。反对节制生育的一方，低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的巨大潜力，他们未认识到，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如果不加节育，人口不到30年就会翻一番，后果是严重的，我不敢苟同，但自己觉得人微言轻，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

1957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之初，并未牵涉到人口问题。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马寅初《新人口论》，但到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风云突变，矛头指向人口问题的老账和新账，我所熟悉认识的人口学者、社会学者的观点 and 主张都受到政治上的批判，几乎全部被划成右派，只有马寅初当时幸免。但其后开展的大批判对马寅初《新人口论》批判得更为严厉，批判文章多达几百篇。对他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8年大跃进，那时候“人手论”更是振振有词，批判变本加

厉。直到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吃饭问题充分暴露后，对人口问题的大批判才冷静下来。但1957年反右斗争和随后对《新人口论》的大批判，把人口的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批判，使人口学者和社会学者噤若寒蝉，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持续了20年。我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暴露出大量人口问题，诸如人口盲目增长，特别是大跃进中高死亡率，人口锐减问题，第一、第二个人口高峰叠加问题等。如果有人口学、社会学存在，稍微重视一下人口统计资料，就很容易发现和预见到当时我国面对的是十分严峻的人口问题。

我作为统计学的教师，对人口统计学是熟悉的，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对人口问题却不敢妄言。现在回头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后就着手控制人口，有点不切实际，那时百废待举，顾不上人口问题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在我国开展节制生育的意见是正确可行的，但又被反右斗争否定了；另一方面，盲目照搬苏联理论和模式，同时也取消人口学、社会学，教条地认为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把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统统归属于马尔萨斯主义。这样把本来有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张旗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的大好机遇给失掉了，这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大失误，几代人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已公开的文件来看，1957年反右运动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是可能的。其一，那时许多干部和群众已经自发有节育的要求，只是缺乏领导、指导和手段。其二，党的高层领导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当时都有过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和论述，毛泽东还提出计划生育这个概念，并提出由政府设一个部门主管，制定规划等。更为重要的是在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遗憾的是未能坚持这条路线，反而开展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直到后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转机。

1953年我调到人民大学，一边任教，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参加马列主义夜大学攻读四门基础理论课，我学习非常认真规范，一周两个晚上雷打不动，每课两小时，每学期用口试方式考试一次。四年间，我参加八次考试，以全优成绩毕业。作为一名人民大学教师，我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和其他教师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展讨论和研究。在此期间，我学习过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确实受益匪浅。我把马克思主义和我过去学过的许多西方理论相比较，确有“一览众山小”之感。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使我立身处世和研究学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大大提高了一步，马克思主义使我后来研究人口学和老年学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在那个年代，还很难完全摆脱阶级斗争的禁锢和教条主义的影响。

在人大统计系工作时，当时系里请来三位苏联统计教授，在讲到人口统计时，一位教授就批判一本苏联布尔亚斯基的《人口统计学》，认为这是贩卖西方人口统计学。这本书我曾看过，其中讲到稳定人口和静止人口模型，只是用了一些数学推导就受到苏联学者的批判。我认为谈的是统计方法和技术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其后，又在一次讨论科研课题时，苏联教授就让戴世光教授写一篇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生命统计的反动本质的文章。我认为生命统计就是研究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个技术方法问题。但在那时，人口

问题是个学术禁区、是“高压线”碰不得的，因而我和很多人都敬而远之。但是长期形成中国人口过多、妨碍中国发展的观念，我还是一直挥之不去。这是我后来愿意献身于人口学的思想基础。

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受邀参加联合国各种人口问题讨论，并要准备参加在1974年召开第三次国际人口会议。在这个时期，全世界都关心第三世界人口激增问题，被认为是世界三P(人口、贫困、污染)问题之首，全世界十分重视，并提出第三世界人口问题必须加以解决。这时，我国人口学、社会学已停办了近20年，只有重新筹组研究人口问题的班子。当时国家计委委托人大党委参加筹组，人大党委从各系选派很多教师参加，可能由于我有英语和统计学的基础，就这样从1972年初，我先从翻译国际文件开始，卷入人口研究，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1974年，我国参加世界人口会议后，有关部门建议，在人民大学原有的研究基础上，正式成立专门人口研究机构，这样我就义无反顾地专门从事人口教学和研究。此后，我就把人口学作为我的专业，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研究，迄今有38年了。

二、人口学在我国是一门不可或缺的朝阳科学

1974年，世界第三次人口大会后，经有关部门建议并得到批准，以人民大学原有人口研究班子为基础，组建一个人口研究机构，这就意味着被取消的人口学得到恢复和正名。在人大党委组建人口机构时，原来在人口研究组的教师大多都不愿意从事人口学研究了，只有刘铮和我以及个别教师愿意兼职。在启动研究时，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人口学这门学科在旧中国很不发达，专门从事人口学的学者屈指可数，留下的著作也不多，传播的人口学知识大多数是20世

纪 30 年代的学术成果，缺乏现代人口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最为缺乏的是完整可靠的人口数据。人口上的争论文章大多是推理论文，缺乏人口变量数据来证实，不能令人信服。可以说旧中国人口学可以继承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新中国人口学几乎从零开始。

其二，闭关锁国。二战后，第三世界人口激增，国外在人口理论观点、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许多创新。在联合国人口委员会资助下，1954 年和 1965 年，在罗马和贝尔格莱德召开过两次较大的世界人口学术会议：并开展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世界生育率调查。在 20 世纪 60 年代，联合国资助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设人口研究机构和人口培训机构，专门培训第三世界人口学人才等等。所有这些，我国当时一无所知，我国人口学与国际人口学不接触，当时，国际人口科学资讯只有来自苏联的这条唯一渠道，苏联的人口科学理论同西方大相径庭，研究方法也相对落后，只能抱残守缺。同国外现代人口学自然有很大差距，要迎头赶上，绝非易事。所幸，1971 年，在联合国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以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北京图书馆内，设立一个联合国资料室，能够取得一些资料来研究。

其三，开拓创新人口学，在当时最为困难是学术环境恶劣。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机构成立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批林批孔、政治大批判之声不绝于耳，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盛行，许多人对当年的大批判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使得他们对人口学敬而远之。但我还是愿意竭尽绵力开拓人口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思想的禁锢不能不影响到人口学的开拓和创新，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后，人口学才阔步前进。

在人口学机构成立之初，虽然心有余悸，但我们在我国现代人口学开拓和创建中，做了许多学科发展基础性的工作，为后来人口学发

展做了铺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和戴世光编写了一本《世界人口统计资料》，合著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指标基础知识》、《人口统计学》，先后主编了《世界人口》，合译了《人口通论》，也编写过《人口理论》。这些书在1978年前后，都相继公开出版了，只有合著的一本《世界几个大国人口问题》没有出版，这些书对后来的教学和研究都起到很大作用。我们所许多同志研究了很多中外人口思想史和人口发展史，翻译了许多英文、俄文的人口著作、文献和资料。我建议创办一份人口刊物，以此来推动人口学发展。1977年《人口研究》首刊出版，至今已有30多年了，至今我还任名誉主编，该刊成为中国期刊方阵期刊。我们也曾出版过几期英文版，出版过几年《人口译丛》，后来因经费拮据不能持续下去。当时物质条件很差，完成这些奠基工作要付出很多的艰辛。

实践的需要是人口学发展的原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国人口学起死回生，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就为我国人口学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由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颠倒了的人口理论纠正过来，人口学者的思想禁锢和余悸得到消除，独立和创新的思想激发出来。改革开放的路线使我国人口学跟上时代的步伐。

1979年，我国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合作，组成我国第一个人口学家代表团出国考察访问，全团5人，4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我是秘书长，我们应邀访问了联合国人口司、人口基金会、亚太经社理事会人口司，世界生育率调查会(WFS)，国际人口学会(IUSSP)、国际人口学研究机构联合会(CICRED)，考察了美国、法国、英国、泰国等国的十几所世界知名的人口研究和教学机构。这次考察大大开

阔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对现代人口学的认识；同时我也结识了多位世界知名学者，我和他们进行学术交流，成为学术同行和朋友。经过这次出国，到2002年之前，我先后出国访问、考察、讲学、参加会议70多次，还曾多次担任过人口、计生、老龄国际组织的理事。在国内也多次担任过人口国际合作项目顾问。在人口学、老年学广泛的国际交流中，我的知识和研究能力极大地提高，也为人大人口所取得很多研究国外人口、老龄的学术资料，使我们能跟踪国际人口学、老年学发展的动向，大大提高我们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人口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这门科学的发展取决于实践对这门科学的需要和这门科学能为实践需要提供智力支持的程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口领域当务之急是控制住第一、第二个人口高峰叠加造成的人口激增的压力。人口学的任务就是要论证、阐明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开展计划生育主要的论据着眼在有利于母婴健康、妇女解放、青年成才等理由，几乎不敢触及从经济上来论证中国人口过剩问题，怕被认为马尔萨斯主义。我认为人口学还必须作更充分的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和许多学者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论，认为人口生产必须和物质生产相适应，过快的人口增长就必须加以控制。我深知这一论证还不够充分和严密，但两种生产必须相适已被大多数人接受。

1979年5月15日，我和刘铮合写了一篇《人口非控制不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事隔20年冲破人口禁区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人口理论文章。自此以后，我从1979~2000年先后从不同角度，诸如从人均国民收入、基本国情、我国资源、环境的等方面来论证；另一方面，从中国四个现代化、人民生活、人口素质，特别是从中国人口增长的巨大潜力和世界人口与发展的比较研究等方面，

来论证中国严格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发表的文章、论文和报告有几十篇，其中发表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和《人口研究》有二三十篇。

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的人口学知识，在国家咨询决策中应起到指导和参谋作用。1979年，我和刘铮、林富德经过调查，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是中国关于人口问题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由我起草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的建议。我们提交的报告被印发给当年经济工作会议作参考。这个研究报告获得教育部第一届人文社科一等奖。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前，我应邀参加一次人口政策讨论，我在会上反对几代人都只能生一个孩子的主张，提出我的建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国家不得已实行的一代人的政策”。1983年，在昆明召开全国人口发展区域规划会议，该会议旨在要求每个地区，按持续只生一个孩子来规划人口，我在会上“舌战群儒”，力排众议反对这个规划，理由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不能持之过久。我认为人口学作为科学应该对一些不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发挥批判的功能，这是人口学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

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要求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开展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在人口学上，低生育率必然加速人口老龄化。因此，对人口老龄化必须有所准备，这是人口学所具有的预见功能。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准备召开国际会议，建议我研究人口性别比和人口年龄结构。经过研究后，我已察觉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略微偏高，并写了一篇论文，这也是一种人口学的预见功能，遗憾的是当时怕妨碍计划生育的开展，性别比问题未安排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国际会

议上讨论，我后来只能在一本论文集中发表。以后我指导一位学生写学士学位论文研究出生性别比，该论文受到国家计生委重视。时隔20年后，该生的博士论文也进一步研究出生性别比，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一本专著，我为该书写了个序，体现我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如果在第三次人口普查以后对出生性别比加以重视，情况会更加主动。但我国出生性别偏高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这也充分体现人口学的预见功能。

人口学发展不能局限于为计划生育服务，人口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提供科学研究成果、培养人口学人才和普及人口知识。改革开放后，我们在过去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世界人口和中外人口思想史基础上，扩大和充实出版了一本《人口学辞典》，我任副主编，这是迄今为止是我国比较规范的一本人口学的专业辞典。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在1980~1995年期间，我除了发表一些论文、文章外，在中央广播台、中央电视台演讲人口理论、人口政策，在北京、上海、辽宁、山东等地对干部和群众作学术报告和普及宣传讲座，1990年，北京市委宣传部授予我国情演讲比赛“灵山杯”一等奖，我后来被推选为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在1995年，中央几个部委授予我第二届中华人口奖(科学奖)。

在人口理论上，很早的时候我就十分关心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过去，我国曾自诩为地大物博，可我研究下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重要资源按人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就接触到可持续发展理论，更加重视我国人口容量问题，发表一些文章，出版了一些著作。在同我国学者合作编写《人口理论教程》中，我主动承担编写全新的《人口和生态环境》一章。20世纪90年代，我主编一本《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史》，被评为精品教材。在1992年，我

在新德里参加中印人口学者讨论会，了解到世界科学院院长的专门讨论科学技术与人口关系的会议，也同时在新德里召开。我从两个会议中，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有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助于扩大人口容量；但也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也要付出各种代价。因此，在科学技术很发达的条件下，人类控制人口和进行人口研究，仍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人口学发展本来就先天不足。改革开放后，人口学迅速聚集了大批学者，他们大多认为进入人口学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为计划生育服务的。由于人口活动基金提供很多经费，让研究人口人员出国学习和考察，邀请一大批学者来华讲授人口学，所有人口机构都能得到图书资料、最新的文件和研究手段，人口机构和研究人员迅速增加。由于人口活动基金的帮助，我国人口学发展很快。在 1980 年前后，开始的第一期援助，就在十个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人口研究机构，第二期增加到 30 个高校，以后全国进一步发展到几十所人口研究机构，显然是过度膨胀。当时，不少人口学研究成果是低水平的重复。

鉴于我国人口众多，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繁重；我建议我国可以打破人口学只培养研究生的外国常规，招收少量本科生，经过教育部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论证，同意在 1981 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人口学本科生。在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氛围下，报考和录取的都是入学考试成绩优异的。先后有十几届毕业生，他们在国内外，很多已成为人口学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不少人成为国家机关的得力干部。在 1995 年，我国本科专业调整，人口学专业被取消，现在改属管理学的人口管理专业。

全党全民经过 30 年的努力，20 世纪末，我国计划生育取得巨大